



國寶回歸
功在千秋

丙戌夏石谷風



「街」のことば

過も、の生活の中で、私は妻・佳子とともに青銅器と帯鉤の収集に努めて参りました。中国のみならず古代東西世界の文化交流を物語る青銅器と帯鉤は、日本で暮らすことの多からた私たちにとて、特に惹かれる作品でありました。

収集とは自己の主観にもとづいて行われる。新たな価値の創造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個人の興味の積み重ねで成り立った一つのコレクションはその人の個性や生き様を如実に浮かび上がらる、いわば「一個の作品」といってもいいものかえりません。私たちの共通した価値観がもってこそ集めることのできたこのコレクションは、二人の人生における思想、経験、趣味が形として表れたものといえます。その一方で、古美術品は古人の知恵と経験が込められ、現在に引き継がれてきた他にかえがたい文化財であることは言うまでもありません。収集者ではなくして「過も」と将来の時代のなかで、作品を借用しているにすぎないということがいえます。

今回、青銅器と帯鉤を始めとする作品を黄地にお渡しすることができたことは、一収集家としてたいへん幸運に感じています。青銅器と帯鉤など中国美術の収集と研究に関して、既に世界的な評価を受けておられます。今後はこのコレクションが黄地に經由中国の美術館に渡り、中国美術の理解や研究に活用されることを願うものです。

平成16年12月吉日

池田 慎太

感 言

在过去的生活中，我和妻子佳子共同热衷于收集青铜器和带钩，不仅是中国的，所有反映了东西文化交流的青铜器和带钩，对于长期生活在日本的我们来讲，都充满了魅力。

所谓收集，大概就是基于主观意识所进行的新价值的创造活动吧！由个人兴趣的积累而形成的某个收藏活动，能够如实地展现收藏人的个性和生活态度，也可以说成是一件作品。正因为我们具备相同的价值观，才得以长期共同完成此项收藏。通过这个收藏，我们的思想、经验、兴趣就以某种形式被表现出来了。同时，古艺术品来源于古人的智慧和经验，传承至今，这是其他无法替代的文化财产。也可以说收藏者不过是处于历史与未来之间借用这些作品而已。

这次，能够将青铜器和带钩等交与黄先生，作为收藏者我感到万分荣幸，包括青铜器和带钩，黄先生对中国美术的收集和研究成果，在世界上已经获得了极高的评价。衷心希望这些收藏能够通过黄先生转交给中国的美术馆和收藏家，并对理解和研究中国美术发挥作用。

平成 16 年 12 月 吉日

(2004 年 12 月)

池田 慎太

池田慎太 日本著名文物收藏家)

中国青铜时代概述

黄海

一

人类文化学中把青铜器与城市遗址、文字视为人类文明史的起源标志。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册中，发轫于公元前三千年前的青铜时代，无疑对促进炎黄子孙开创的华夏民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发挥了无可比拟的巨大作用，创造出了独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璀璨夺目的青铜时代。

大约从夏代开始，中国进入青铜时代，到了商代，青铜时代进入繁荣时期，青铜器的应用几乎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青铜制品包括礼器、乐器、兵器、工具、车马器、装饰器等等，有力地促进了商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艺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青铜器成为我国文化艺术遗产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折射出夏、商、周至秦汉时期，即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初期社会物质文化的原貌。

据文献和考古资料证明，夏代已开始出现了铸造铜器。河南师偃二里头洛达庙类型遗址中发现了青铜小刀，这一发现说明夏代已经有冶铸铜器手工业的可能性存在。但作为青铜器艺术的形成则应出现于商代早期，即公元前17世纪至公元前14世纪。以后经历了商代晚期、西周、春秋、战国及秦约1200年左右，是青铜

器艺术达到高度繁荣的时期，在工艺美术史上占有显赫的地位。

从人类文明的视角观察，青铜技术的发现，无疑是人类认识自然和利用自然的一次革命。大约在公元前七千年在两河流域的安那托里亚人们就懂得了冶金术，通过对探集到的一些天然的铜进行锻打加工，发现了铜的性能。在古埃及，大概在公元前四千年就进入了青铜时代，欧





洲略晚一些，约于公元前三千年，南美洲也大约在同一时期，人类进入了青铜时代，但这些早期的青铜文明很快就灭绝了。古印度也略比中国早一些，但很快也湮灭无闻了。中国先民对青铜技术的掌握，大约要比西方晚 1000 到 2000 年，但为何中国的青铜时代能够既璀璨夺目又独具一格地将青铜的技术与工艺推向巅峰呢？用《左传》中的话来解释，即中国的青铜器具有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独特功用与内涵。中国先民自上古时代就有祭祀的传统，青铜器出现之前用玉器和陶器祭祀神灵祖先，自掌握青铜技术以来，精美的青铜器就成为国家的礼器，用来祭祖祀天了。戎，即征战，金属铜制成的兵器自



青铜器鼎的造型

然强于原先的木、石工具百倍，所以，青铜制成的兵器，成为了征战掠地的理想兵器。

中国的青铜文明与世界上任何一种青铜文明相比，都称得上是辉煌夺目，独具一格；在青铜器的铸造上，中国先民赋予了青铜器以美轮美奂的艺术形式，就造型和纹饰而言，是世界其他文明古国青铜时代所没有的。有专家研究称，之所以要铸造出诸多繁复、精美和带有神秘色彩的装饰纹样，主要是为在祭祀时有助于巫师通过这些神秘而抽象的装饰来沟通天地、神灵，沟通过去、现在和未来。

著名青铜器专家马承源先生在《中国青铜器的发展阶段》一文中，按照青铜器艺术发展的历史，将中国的青铜时代划分为五个时期：其一，育成期。即商代早期，是青铜器艺术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其二，兴盛期。包括商代晚期至西周康、昭之间，为青铜器艺术的蓬勃发展时期；其三，转变期。包括西周穆王满至春秋早期，这一时期也正处于奴隶制社会经济的逐渐衰弱，周王朝政治权力旁落，诸侯国经济有较大发展之际，列国的青铜器大量出现，纹饰及铭文书体都已出现了显著的变革；其四，更新期。包括春秋中晚期，战国及秦代，这时由于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社会性质改变后新兴地主阶级需求的刺激，使青铜器艺术出现了新的高潮；其五，衰退期，这一时期为汉代，这时因为漆器、早期青瓷和釉陶的广泛使用，西汉时期便成为了中国青铜艺术的衰落时期。

二

中国青铜器的发展历程正是与社会发展的生产力水平相辅相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讲，青铜艺术的进步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进步，反过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又有力地提升了青铜文化的生产和繁荣。

在青铜时代的育成期，即约为商代盘庚迁殷以前，青铜器的形制特征主要为：扁体的平底爵，狭流，有钉锥形柱；有菌形柱或钉锥形

柱的三足中空平底耳，鼎、鬲的立耳尚未发达，通常的半环式，有一足与一耳成直线，呈不平衡状。鼎、鬲的三足多锥形中空，开始出现扁足鼎，尊、觚、盘等圈足有宽大的十字孔。从纹饰看，已出现了兽面纹(即饕餮纹)的构图，雷纹开始应用，但不作地纹；两侧斜三角的目纹，不成形或成形的动物躯身纹、羽毛状的阴阳线刻平雕纹等等。虽然此时期生产的青铜器为数不多，但从应用领域看，已出现了烹饪器、酒器、水器、武器和礼器等器物。从艺术性上看，虽还较为朴素、单调，但却已在铸造工艺上取得了相当可喜的成就。自商代晚期到西周昭王时代为青铜时代的鼎盛期，这一时期青铜器在形制和纹饰上虽与育成期有相同和近似之处，但却在铸造上和纹饰上较前有了更多的新发展和变化。主要表现在出现了许多此前没有的新颖纹饰，如，以排列有序的雷纹和羽毛纹线条构成的兽面纹，平雕也更为繁复精细，还出现有采用圆浑的浮雕等。从安阳西北冈出土的青铜器形制看，出现了耳部极发达鼎，有分档鼎、双耳簋、低体不分档的卑、袋足、大口方形尊、鸮卣等。乐器中的组铙也出现了。纹饰大量采用平雕与浮雕相结合的方式，器物的立体附饰尤为发达。牛方鼎、鹿方鼎、司母戊大方鼎等体制巨大的青铜器出



青铜器鬲的造型

现，标志着铸造技术的巨大进步。西周早期青铜器的铸造技术与艺术，继承了商代遗制，只是在器类和造型设计上略有增添和改进。

鼎盛期青铜器纹饰上的另一特点，则是在图案单位上除了主题外，常常以各种动物形象体为配置，一器少则二三种，多则可达七八种，甚至更多，使器上无空白处；纹饰的物象形态狰狞可畏，既庄严神秘，又富有生气，形成其独有的时代风格。再者，此时青铜器的铭文书体，标志着我国书法艺术发展进入了一个重要的阶段，书体或清劲隽美，或淳朴严峻；笔画中的细笔与粗笔相间，书写时更注意到行款章法间的联系。

中国青铜时代的转变期，始于西周穆王，止于春秋早期。划分的依据是1954年从西安普渡村出土穆王时的标准器通簋等，在形制及铭文风格上均为西周早期所不曾具备的，通簋尊口环耳、圈足下方承三足，浑身施平行沟纹，这种形制和装饰是西周中晚期簋类中的主要形式之一。从穆王开始，出现了一系列的变革，构成了与西周早期青铜器的显著分界。这一时期的特点表现为：一方面出现了窃曲纹、退化的兽面纹、平行沟纹，及趯曹鼎、免簋、透簋、师祝簋、师遽方彝等新的形制；另一方面仍保留了相当一部分西周早期的遗风，如刺鼎、长白簋、免



尊、守宫盘等形制及某些纹饰。这些充分说明此时期为青铜时代的新旧交替过渡期特征。西周晚期的青铜器，存世数量最众的当为厉王时代，如大克鼎、史颂鼎、颂簋、颂壶等新形制相继产生；纹饰以波曲形带纹广为流行，对窃曲纹加以大胆的简化和变形，兽面纹和兽形纹亦有所变形，另外还出现了鳞带纹等纹饰，西周早期的遗风已极少出现。这些标志着青铜时代过渡期的完成，进入了成熟繁荣的时期。而春秋早期的青铜器，则在形制和纹饰上均与西周晚期的风格特征一致，以至于人们很难准确地判断西周晚期与春秋早期青铜器的年代。从铭文书写上，转变期青铜器铭文书体向着便捷的方面发展，其格局和气度虽不如鼎盛期时那样谨严精致，但在结构上的豪迈奔放和浑柔圆熟却是前所未有的。笔势的和谐浑厚及行列的对称呼应，形成了这一时期铭文的共同特点。

春秋中期至战国、秦为青铜时代的更新期。从秦景公的秦公簋、秦公钟，宋平公的宋公戌铸，鲁襄时代的邾公轻钟以及邾公华钟的形制和装饰来看，虽未脱尽转变期的格局，却有了较多的新纹饰和新风格。从鲁昭后期的青铜器观察，无论是其形制、纹饰还是铭文书体，都出现了很多的变化，与此前大不相同。在形制方面表现为两大特点。一是对传统形制的改革，一是积极创新。浑源的青铜器群是北方地区代表的一个典型，寿县蔡侯墓的青铜器群是南方地区代表的一个典型，而新郑的青铜器群则是



中原地区的一个典型。这些春秋晚期的青铜器群，在形制上丰富多彩、新颖奇特让人耳目一新。在纹饰上，这一时期出现了细密的蟠螭纹、蟠蛇纹及躯体饰以雷纹的盘绕的带翼龙纹，还出现了狩猎纹等。错金、银，赤铜及绿松石的华丽纹饰也发展起来。战国初期还发明鎏金银的装饰。战国中晚期的青铜器纹饰，除细密华丽外，也出现了许多素净不施纹饰的器物，如陈侯午敦、陈侯因咨敦等，安徽朱家集李三孤堆出土的楚王墓铜器群，也绝大多数不施纹饰，这说明战国晚期素饰的倾向开始普遍起来，但并没有形成这一时期青铜艺术的主流风格，整个战国时代，青铜器的纹饰仍是非常的华丽繁复的。秦代作为第一个封建王朝，仅存在短短的15年，迄今为止可确认为秦代的青铜器极为罕见。1950年洛阳西宫出土的4件刻铭为秦代的青铜器，纹饰特征与战国接近。另外，从咸阳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的某些陶器纹饰来看，基本上还是战国的格调。更新期青铜器的艺术装饰种类繁多，纹饰之精细富丽，超过了以前任何一个时期。这一时期的代表纹饰之一就是所谓的“蟠螭纹”或“蟠虺纹”。这种纹饰以极小的蟠曲形兽体组成，实质上是前期“窃曲纹”的缩影和变化，有的具有首尾，带龙蛇之类的体形，有的仅有简单的线条而不辨首尾。与此相类似的还有上下左右缠绕交结的精致的蟠龙图案，细察其形象，各有繁简不同。纹饰



青铜器盖的造型

的另一典型是“蟠龙纹”，一类为交结纠缠为连结式，一类以兽面为中心的向两翼展开的；后者的兽面上还常附饰有微小的龙蛇，龙蛇从兽面的口中穿过，龙体作带状，中间饰以雷纹或鳞纹，有的还常有翅膀。这种逶迤曲折的纹饰，就是“飞龙在天”的飞龙。图案极力表达出物象运动的姿态。鸟纹，在此时期也表现得极为复杂，华丽的凤鸟似在鸟纹中有重要的地位，其他的水禽，如凫、鸭等都被选为青铜器的装饰图案；飞禽有鹤、雁、天鹅等，其中雁和天鹅的图案多见于北方地区的铜器上。具有神话传说意味的一些图案也常见于青铜装饰上，如《山海经》中描述的鸟蛇搏击等也成了装饰纹饰。由鸟兽变形的三角云纹和长方块状的连云纹，将直线与弧线和曲线虚实相间地交结一体，给人以绚丽变幻的视觉，这些图案中大多都镶嵌有赤铜、金、银、绿松石等，构造出华美夺目的艺术美。更新期青铜器纹饰具有创造性发展的是描绘当时贵族们战斗、宴乐生活实况的画像，这是以绘画为底子的刻铸或镶嵌的纹饰，诸如建筑、园林、人物的活动，宴会、舞乐、车猎、鸢射、攻战；乃至采桑等结构复杂的场景。以当时的水平而忠实地描绘出来，有的更是精细入微。在北方地区，“狩猎纹”尤其盛行，在布局结构上充分体现了绘画的特色。因此，我国青铜器上的画像，可视为汉代画像艺术的先

驱。此时的铜器铭文书体也由于各国文化的急剧发展，而与时俱进地呈现出百花齐放的风格，或成熟优美，或清新规矩，或流利修长又富于变化，促使中国书法艺术进入了变动求新求异的新阶段。

汉代立国后，经过短暂的休养生息过后，便迎来政治、经济和文化大发展的“文景之治”。手工艺技术领域的高度进步，使漆器、青釉陶的制造水平不断提高，以至于漆器、釉陶大量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从而取代了笨重价昂的青铜器。而冶铁技术的发达，铁制兵器也逐步代替了铜制兵器。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直接导致了青铜艺术的衰退。值得一提的是铜镜的制作成为此时期青铜艺术的一大亮点，呈方兴未艾、缤纷绚烂之势。衰退期的青铜器纹饰，大约可分以下几个类型：一是几何形图案，通常有菱纹、叠瓣纹和三角纹，而且，这些图案还往往配饰在同一器物之上。二是云气、龙、虎、朱雀、玄武等纹饰，有的还并饰以山川、羽人、神仙等纹样，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是汉人崇拜的“四灵”，神话传说中的东王公、西王母历史故事等都成为青铜器装饰中所表现的主题。汉代青铜器的装饰，除铜镜、洗、锅炉等器物外，极少模制而多为刻纹。但其刻画技术之纯熟精湛，所表现题材之广泛却有独到之处。尤其是在铜镜的范铸技艺和装饰题材风格上，既大胆创新又极富成就。总之，汉代的青铜艺术已失去了此前所拥有的地位，而成为工艺美术中的一个古老的门类，与漆器、釉陶等骈美共存而已。

中国青铜艺术的发生、发展、繁荣、演变和衰落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在各个历史时期中社会生活的面貌，反映了人们在不同生产力发展条件下的审美取向和价值取向。青铜时代创造出别具一格的中国青铜艺术，集铸造、雕刻、书法、绘画等于一体，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臻美的历程后，不但为中华民族创造出一簇璀璨的文化奇葩，而且对中华文化以后的艺术发展产生了悠久而深远的影响。



青铜器纹饰举例

图版目录

商中晚期

1. 弦纹鼎 1
2. 兽面虎纹彝 2
3. 叔簋 3
4. 兽面雷纹爵 4
5. 夔凤鸟纹方鼎 6
6. 龙纹罍 8
7. 素方鼎 9
8. 父乙爵 10
9. 白作宝彝鬲 12
10. 子矜(媚)觚 14
11. 饕餮纹觚 16
12. 饕餮纹鼎 17
13. 父丁卣 18
14. 兽面纹尊 20
15. 兽耳凤纹簋 22

西周

16. 父乙大(天)鬲 24
17. 饕餮纹鼎 26
18. 蝉凤纹簋 28
19. 龙耳兽足簋 30
20. 变形兽面纹盂 31
21. 龙首乳足卣(一对) 32
22. 匱王盘 34
23. 酉大师甗 36
24. 白大师旅盃 38
25. 兽面纹盘 39
26. 棱纹鬲 40
27. 兽面纹簋 42
28. 兽耳簋 44
29. 皇祖鼎 46

春秋

30. 龙凤纹兽耳尊 48
31. 吴王鼎 50
32. 环耳素面鬲 52
33. 兽形窃曲纹匜 53
34. 夔龙纹豆 54
35. 虺螭纹豆 55
36. 蟠蛇纹盖鼎 56
37. 蟠虺纹编钟 57
38. 蟠螭纹兽耳鉴(一对) 58
39. 兽耳钫 60
40. 蒜头壶 61
41. 提链盖壶 62
42. 瑞兽 64
43. 变形蟠龙凤纹甗 66

战国

44. 五环壶 68
45. 鎏金虎形镇(一对) 70
46. 茶花纹矮足敦 71
47. 蒜头扁壶 72
48. 带盖附耳鼎 73
49. 牛形镇 74
50. 错金银朱雀提盃 76
51. 错银虎形尊 77
52. 错金银镶嵌虎形饰 78
53. 兽足龙纹提梁壶 80

汉

54. 蛙纹鼓 82
55. 鎏金三羊足兽面双耳钵 84
56. 鸭形熏炉 85
57. 鎏金熊镇 86





1. 弦纹鼎

商代中期 通高 14 厘米 口径 12.1 厘米

2003 年 7 月购于日本东京

立耳，圜底，腹微敛，柱形足。口沿下饰以两道弦纹，整器朴素无华。内壁铸铭文一字“可”。



2. 兽面虎纹彝

商代晚期 高 20 厘米 长 13 厘米 口横 10 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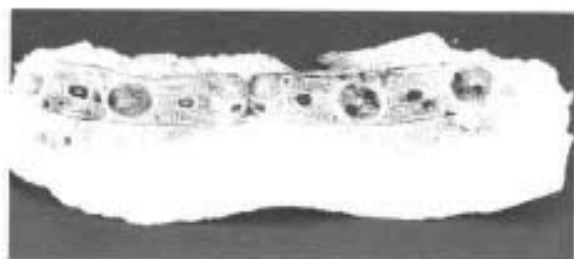
2004 年 3 月购于日本京都

四阿形盖及盖钮，器为长方体，器壁直而下部略收，圈足每面中间均有一缺口。盖、器四隅及中线均出棱脊。盖钮饰阴刻的倒置兽面纹，盖饰倒置的卷角兽面纹。口沿下饰相对的虎纹四对，腹饰兽面纹，两侧配置有小的回顾式龙纹，圈足饰相背的龙纹。整器纹饰均填以规整的雷纹，主体纹饰作浮雕，纹饰层次分明，构图精细，铸造精美细密。



2





3

3. 叔簋

商代晚期 通高 12.8厘米 口径
19厘米 通宽 26厘米

2004年3月购于日本京都

侈口，束颈，鼓腹，高圈足，腹
两侧有双耳，耳上饰以鹿首。颈有纹
带一周，带中部为一羊头饰，羊头两
边等距离分布有圆形火纹，火纹间
为环形龙纹。圈足上有四对相对称
的龙纹，内填以云雷纹。底内有四字
铭文：“叔作宝彝”。

注录：罗振玉《三代集金文存》





4. 兽面雷纹爵

商代晚期 通高 17.7厘米 口径
14厘米

2005年3月购于日本大阪

形制高挑修长，圆度高杯式体。腹壁较直，细圆鉴上铸有牛首，有腹饰一周鳞形雷纹，纹饰洗练；三足为宽、扁的刀形。风韵自见，在青铜器中极其罕见。有三字铭文。



4









5. 夔凤鸟纹方鼎

商代晚期 通高24.8厘米 口长19厘米 宽15.2厘米

2005年购于日本东京

饪食器。长方体，立耳，腹下微敛，柱足稍长，口沿下饰凤鸟纹带，以短棱背为鼻。下为乳钉纹框。腹部四隅有棱背，足上部饰兽面纹，亦有短棱背，实出如高浮雕。甚为精美，此鼎为商代晚期王侯的青铜祭器。器制古朴精美，形体厚重，对研究中国冶铸发展史有着重要的意义。



8



6. 龙纹罍

商代晚期 高 23厘米 宽 20厘米 口宽 16厘米

2003年11月购于日本大阪

盖为圆形，盖钮为伞式。圆颈，腹部往下凸起，平底，圈足低而向外张。盖和颈部饰以形纹，肩部饰蝉纹，腹下部饰以垂叶龙纹，垂叶宽面中各含有兽面纹。底座齐整均匀地排列有三圈乳钉纹。整器从盖顶到底足有四条略突棱线分割，左右分别有一半圆形兽耳。